

doi: 10. 3969/j. issn. 1672-0598. 2009. 05. 002

从马、恩对未来社会设想到中国模式 ——论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

吴 坚

(浙江省委党校,浙江 317300)

[摘要] 由“两个必然”势必引出一个全新的历史课题:即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未来的社会主义道路究竟该往何处去?也就是必须要首先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综合考察马、恩对未来社会设想以及国际共运史相关史实,运用史论结合的方法,对东方落后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如何建设、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艰难探索历程作一现象描述和理论探讨。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学说;未来社会设想;社会主义实践;中国模式

[中图分类号] J A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 - 0598(2009)05 - 0005 - 05

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包括三个基本组成部分,科学社会主义是其核心内容。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的剩余价值学说基础之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最终得出了“两个必然”: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

由上述“两个必然”势必引出一个全新的历史课题: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本文将综合考察马、恩对未来社会设想以及国际共运史相关史实,运用史论结合的方法,对东方落后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如何建设、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艰难探索历程作一现象描述和理论探讨。

一、马、恩未来社会设想的相关论述

1. 早期对未来社会的天才设想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资本论》第一卷等早期著作中,马、恩以当时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为背景,以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为前提,在揭露资本主义不合理制度及其暂时性的基础上,就未来理想社会的图景作过多种描述。概言之: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没有阶级,没有剥削和压迫;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社会分工消失、三大差别消灭、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

产品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国家消亡、社会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

应该指出,马、恩早期对未来社会的“天才预示”,仍大量地继承和保留了16—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成果。生产资料公有制、有计划地组织生产、没有城乡之别和工农差别、劳动从谋生手段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按劳分配、按需分配、废除国家等等思想散见于圣西门“实业制度”、傅立叶“和谐制度”和欧文“劳动公社”的设想中。而在马克思“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1]的描述中,我们也仍能看到一种对未来社会的近乎乌托邦的浪漫想象。

2 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主要见于《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和《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等文献。从1859年开始,马、恩密切关注俄国的每一步社会变革。到了70年代,马、恩更是一再预言,俄国革命迫在眉睫,指日可待,而“只要俄国一发生革命,整个欧洲的面貌就要改变”^[2]。进而,马、恩第一次突破了主要以西方国家为背景的科学社会主义构想图式,论及了东方落后国家如何实现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 [收稿日期] 2009 - 04 - 28

[作者简介] 吴坚(1970 -),男,浙江人,讲师,县委党校函授站站长,浙江省委党校08级师资班在读研究生。

马克思所引用的“卡夫丁峡谷”一词的含义,意指“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果”^[3],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整个阶段,由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直接进入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阶段。从“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原理出发,马、恩得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必然具有世界性的结论。根据世界革命理论,西方将在东方影响下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并反转身来大大改变和加速东方落后国家的历史进程,使之跳跃式地直接走向社会主义。

3. 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从1845年开始,马、恩在《爱北斐特集会上的演说》、《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资本论》第三卷、《法兰西阶级斗争 导言》等著作中反复论及无产阶级和平夺取政权问题。认为:“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方面都已经过时了”^[4]、“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5]、“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6]。

《法兰西阶级斗争 导言》发表当年,恩格斯在致理查·费舍的信中明确声明:“我认为,如果你们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7]。显然,恩格斯虽然强调要充分利用普选权等和平合法的斗争方式,将之视为对“暴力革命”策略的重要补充,但他绝没有因此从根本上否定“暴力革命”。换言之,马、恩所主张的是“暴力与和平”两手^[8],这与伯恩斯坦等人所宣扬的彻底否定暴力革命而一味追求和平改良的机会主义是有原则区别的。

4. “我们没有最终目标”

马克思在1881年给纽文胡斯的回信中指出:“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不着边际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9]。恩格斯于1893年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发表关于德国局势看法的谈话。再次指出:“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10]。事实上,马、恩晚年已经超越年轻时代所设计的未来社会模式,转而更加强调从实际出发,认真研究资本主义的新变

化,依此来确定无产阶级革命的政策和策略。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没有最终目标”,并不是伯恩斯坦所曲解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我们应当依据上下文的意思和语境,将恩格斯的谈话当作一个有机整体来加以解读。恩格斯所说的“没有最终目标”,是指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不可能有“预定看法”的意思,决不能误认为恩格斯最终放弃了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共产主义”理想。

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与终结

1. 列宁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与实践^[11]

第一阶段:通过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直接过渡”。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列宁一度寄希望于世界革命大面积爆发。然而,欧洲革命很快被镇压下去,帝国主义列强组织了十四国武装干涉,发动了遍及全俄的白卫军和富农暴乱,新生苏维埃政权内忧外患,成为资本主义汪洋大海里的一座“红色孤岛”。在当时残酷的战争环境和物资极度缺乏的特殊条件下,列宁被迫临时采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之后1920年俄共(布)九大通过决议,高度评价“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认为可以“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产品生产和分配”^[12]的方式,更迅速地向理想中的社会主义体制“直接过渡”。原先作为应急措施提出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据此被肯定为自觉的过渡措施而进一步得到补充和强化。一场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危机在国内战争结束后接踵而至。实践证明,作为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一种尝试,“战时共产主义”无疑是失败的。

第二阶段:通过新经济政策“迂回过渡”。以1921年新经济政策和晚年五篇论文、三封信件“最后遗嘱”为标志,列宁从俄国经济文化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国情出发,提出了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构想:

(1)“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13];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准备作几千次尝试”^[14]。(2)俄国小农占优势,向社会主义不能直接过渡而只能迂回过渡。(3)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15]。(4)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取决于“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

坏”^[16]。(5)“我们每前进一步和每提高一步都必定要同时改善和改造我们的苏维埃制度”^[17]。

在列宁看来,新经济政策“是一个要在若干年内长期实行的政策”,是“我们找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途径的唯一办法”^[18]。遗憾的是,斯大林将这一政策视作权宜之计,于1928年将其断然中止了。

2 斯大林模式的形成与失败

所谓斯大林模式,是指在斯大林带领下,经过全盘农业集体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大清洗运动,以苏联1936年宪法通过为标志,最终建立起来的一整套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其基本特征:

(1)经济上:高度集权的国家统制,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以行政手段代替经济管理。(2)政治上:高度集中的一党制,三权合一,国家安全部门凌驾于正常权力之上。(3)文化思想上:个人崇拜,高度思想垄断,行政干预学术文化。

斯大林模式是苏联在战争威胁日益逼近的特殊环境、特定历史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实质上是另一种“战时共产主义”体制。两者相似之处颇多,如对经济实行高度集中的国家统制;采用行政命令的办法进行经济管理;大量地对农民强行剥夺以支持工业的高速发展;完全否定市场与货币的作用;以恐怖手段压制不满等等。斯大林模式因此又被称为是“兵营式的社会主义”^[19]。

苏联本应在“二战”结束后及时对原有体制加以变革,重新回到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轨道上来,但斯大林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而在1947年欧洲9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决议中将它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固定化、神圣化。而其继任者赫鲁晓夫等人一方面全面否定斯大林,另一方面又把斯大林体制视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完全加以肯定。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斯大林模式一党揽权、个人专权、层层集权、干部特权、对外霸权的弊端日渐暴露,严重“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形象”,最终给苏联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灾难性后果。

三、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与中国模式

1. 毛泽东:从“以俄为师”到“以苏为鉴”

毛泽东在建国前夕指出:“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20]。1953年,毛泽东在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进一步号召:“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

然而1955年底毛泽东即提出“以苏联为鉴”的问题。毛泽东对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其成果主要集中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两篇文章及其他一些讲话和著作中:

(1)经济上:工业与农业并举,扩大地方权力,“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2)政治上: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反对个人崇拜,“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惩前毖后,治病救人”。(3)思想文化上:批判地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4)社会主义理论上:基本矛盾仍然存在,“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毛泽东带领我党“以苏为鉴”,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所取得的最初成果,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先声。可惜这一探索由于1957年国际波匈事件和国内右派分子进攻而被迫中断。

2 改革开放催生中国模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我国改革开放新时代,标志着我党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进入了一个自觉的成熟的阶段。学术界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开始热议“中国模式”问题。中国模式也被世人称为“北京共识”、“中国道路”或“中国经验”。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把中国近30年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提炼成“十个结合”。“中国模式”有很多种解读^[21]，“十个结合”即是“中国模式”的相对权威的官方解读。

“十个结合”从基本经验层面论证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主要内涵及其特征,形象地回答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2],科学地解答了马、恩未及预见,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也未能很好解决的东方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为社会主义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找到了新的发展模式及实现形式,是社会主义中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走向光明未来的宝贵财富。

四、结论和启示

1. 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是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统一

真理的两重性告诉我们,任何真理性的认识都只是由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转化过程中的一个环

节。“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23]。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应该着重学习、掌握、运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完整体系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绝不能把目光仅仅停留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某些具体结论、个别论断乃至只言片语上。

马、恩一再强调:“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24]，“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25]。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马、恩从不把自己的思想绝对化,而总是跟随历史发展,依据客观实际,不断修正、充实和发展自己的学说。在未来社会设想问题上,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是对社会主义实现途径的新发展,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是对无产阶级斗争策略的新发展,而“我们没有最终目标”则是对早期未来社会设想的积极扬弃。

2 斯大林模式的失败主要地归因于对马、恩学说的教条式理解

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只能顶礼膜拜的神圣教义,把发展马克思主义视为离经叛道,习惯于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特定历史时代特定事件的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以停滞不前的思想观念和经典作家的某些词句来判断和评价不断发展、无限丰富的现实生活;以马克思主义著作中针对特定对象开出的药方作为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因而是与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的。

马克思曾以“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26]来回应法国“马克思派”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倾向,也曾明确指出:“所谓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变革的社会”^[27]。斯大林模式的根本错误在于:一是无视马恩对未来社会设想的前置条件,超越历史发展阶段,在东方落后国家强行实践马恩的早期社会主义设想。二是无视时代发展要求与各国具体国情,形而上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用排斥异己的无情斗争手段对付一切纠正传统模式的努力。

3 从列宁新经济政策到中国模式,共产党人成功找到了一条有别于跨越“卡夫丁峡谷”最初设想的新路

马、恩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的立论基础是世界革命理论和东西方革命的“互相补充”。然而,东方社会主义革命并非按照与西方革

命“互相补充”的方式,而是按照“一国社会主义胜利”的方式发展的。囿于历史条件和实践水平,马、恩并未提及在西方革命没有发生的前提下,落后国家可以依据正确的认识,主动地从西方资本主义那里获取“肯定成果”,独立地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28]。

在苦等世界革命高潮未到和“直接过渡”遭受失败之后,列宁认识到:“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29],并着手以新经济政策为起点,有意识地为俄国社会主义寻找一条有别于跨越“卡夫丁峡谷”最初设想的新路。从某种意义上说,邓小平“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30]就是对“新经济政策”的恢复和发展^[3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模式就是对马、恩跨越“卡夫丁峡谷”最初设想的新解答、新跨越。

4 民主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部分地证明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现实可能性

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党和社会党国际思想体系的总称,由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右翼发展而来,于 1951 年建立社会党国际,目前拥有 169 个成员党,4000 多万党员。在 20 世纪整个后半叶,社会民主党成为欧洲政党轮替的两大主角之一,“二战”以来先后已有四十多个社会党上台执政。

民主社会主义者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社会进程,以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和护士”自居,主张以对经济的民主监督取代消灭私有制,以实行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来缓和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实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混合经济,实现生产领域中的资本主义、分配领域中的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虽然分属两个不同的思想体系,但社会民主党通过“议会和平道路”执政、在资本主义框架内部分地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做法,既可视作对西方传统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积极扬弃,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为我们证明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现实可行性。

5 不断完善中国模式,为丰富人类的共同价值作出自己的应有贡献

“十个结合”集中体现了理论与实践、共性与个性、目标与手段、两点与重点、主体性与客观性、长期性与阶段性、坚定性与灵活性、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当代中国的创造性运用。以“十个结合”为现阶段主要标

志的中国模式拓宽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丰富了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和道路的认识,促进了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正在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新兴大国乃至西方发达国家产生越来越大的吸引力,是当代中国人民对世界文明和人类社会进步作出的新贡献。

另一方面,正如胡锦涛同志在 2008 年“12·18 重要讲话中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而是应该坚持不懈地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不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C]. 85.
-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C]. 134, 431.
- [4][5][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C]. 595, 607, 273.
-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9 卷)[C]. 401.
- [8] 肖楠. 我们要理解和读懂恩格斯——评谢韬先生有关恩格斯晚年思想发展的两种说法[J]. 理论前沿, 2007(5): 24 - 27.
- [9][23][24][25][26][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C]. 643, 742 - 743, 681, 337 - 338, 474, 693.
-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C]. 628 - 629.
- [11] 江海燕.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M]. 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4: 26 - 29.
- [12][15][17][18] 列宁选集(第 4 卷)[C]. 570, 623, 613, 533 - 660.
- [13] 列宁全集(第 43 卷)[C]. 367.
- [14][16][29] 列宁全集(第 34 卷)[C]. 329, 171, 466.
- [19] 李宗禹等. 斯大林模式研究[C].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9: 43 - 44.
- [20]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C]. 1480 - 1481.
- [21] 俞可平等. 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C].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15 - 17.
- [22] 董建萍, 章其祥. 全面理解和把握“十个结合”宝贵经验[N]. 浙江日报, 2009 - 03 - 02.
- [28][31] 蔡金发. 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M].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7: 684 - 704, 392 - 410.
- [30]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C]. 203.

(责任编辑:朱德东)

Using Marx and Engels envisaged future to design the Chinese model of society

—On the road of socialist development, theory and practice

WU Jian

(Zhejiang Xianju County Party School, Zhejiang Xianju 317300, China)

Abstract: The two inevitable trends are bound to lead to a new history of the subject, that is, after the victory of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where is the future of the socialist road to? First of all, that is necessary to find out "what socialism is and how to build socialism."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surveys Marx and Engels envisaged the future of society as well as the history of the relevant historical fact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the history of the use of combined methods, backward countries of the East after the proletariat to seize power, how to build, how to consolidate and develop the socialist course of this difficult exploration of the theory to describe and explore the phenomenon.

Key words: Marxist theory; idea of future society; the practice of socialism; Chinese model